

工商业者的改造问题

(駁斥章乃器等右派分子
反社会主义的謬論)

張 萃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一、資本家是全靠剝削劳动者起家的·····	(2)
二、贖买不是購天而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的 一种形式·····	(4)
三、定息的性質和民族資产階級的兩面性·····	(10)
四、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	(16)
五、必須向工人階級学习·····	(22)
六、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項根本制度·····	(27)
結束語·····	(31)

前 言

在中国共产党今年开展的大規模的整风运动中，大多数工商界进步人士，向党提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加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等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議和批評，这是好的，是为党所欢迎并随即加以研究改进的。但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却异想天开，利用党的整风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們不仅散布許多反动的謬論，而且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妄图挑撥工商界和政府的关系，煽动工商业者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为资本主义复辟鋪平道路。

中国人民百多年来，不屈不撓前仆后继地英勇斗争，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結束了長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使我們的祖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現在，右派分子公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抵死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梦想把我們的国家拉回到旧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絕路上去。这是全国劳动人民所絕對不能容許的，也是一切真正爱国者所坚决反对的。因此，我們和右派之間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兩条道路的对抗性的斗争；是关系着国家民族命运的生死斗争；也是关系着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严重斗争。

为了卫护共产党的领导，保証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須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澄清工商界的言論与思想混乱，使广大工商业者端正認識，明辨大是大非，繼續进行“脱胎换骨”的本質的改造，把自己改变成名副其实的光榮的劳动者，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

1957年10月

一 資本家是全靠剝削勞動者起家的

在工商界中，以李康年為代表的右派分子提出所謂贖買就應該贖買到底，定息應該延長到廿年，還有所謂發行贖買存單、贖買公債的主張。為什麼呢？據說是因為政府“欠”了資本家的“債”。李康年說：“無論贖買也好，購買也好，這是不是合理措施呢？如果說是合理措施，則資本家自己將生產資料交出而政府說並不是欠他的債非還不可，這成什麼話呢？這是丟却贖買意義了。”（載六月六日人民日報）還有人說：“工人階級進入社會主義是赤手空拳，資產階級是帶著禮物進來的。”這真是豈有此理！

究竟是誰欠了誰的債呢？應該怎樣理解贖買政策呢？為了說明這些問題，首先必須弄清資本家的資本是從哪里來的。

有不少工商界人士，在談起自己的“發家史”時，總愛說成是由于自己起早睡晚慘淡經營而發家的，也就是所謂勤儉起家的；還有的說是由于自己有錢，是“將本求利”慢慢發展起來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某些資本家在經營管理上有某一些才能，但是，一個農民變成富農，一個手工業者變成資本家，都絕不是靠自己的勞動；相反地，總是因為他們對勞動者進行了剝削，他們對於勞動者剝削的愈多，賺的錢也就愈多。上海華中紡織印染公司和力台機器廠經理張錫麟在二十八年以前是一個小職員，每

月只賺二十元工錢，后来他成为一个拥有三个企业的資本家。他說：“我这些錢是不是起早睡晚，辛辛苦苦、克勤克儉就能够获得的呢？不算賬是搞不清的，我自己算了一下細賬，明白了。就是說：假設以廿八年前每月我拿二十元工錢的收入，一个錢不用掉，將这二十元如数存起来，需要經過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年的积累，也就是說我要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岁以上，才能办起这些企业。事实証明，我这些錢不是从剝削而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引自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三日大公报）如果資本家都象張錫麟先生这样算算賬，就会得出同样的結論。

但是，也可能有人不服气，他們認為：自己最初創業的資本畢竟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可是人們知道，即使資本家原先是一个劳动者，但他后来利用自己积累的財富去进行剝削，变成了資本家，問題的本質仍不能改变。因为，完全凭个人劳动换来的錢，畢竟是有限的，而个人消費却一天也不能停止，到一定时期后，原来由自己劳动积累起来的資本，也必然被耗費光了。他手中所有的資本，便都是从劳动者身上剝削来的，是由剩余价值轉化而来的。比方說，在正常情况下，假定有一个資本家拥有一万元的資本（姑不論这一万元是怎样来的橫財），他每年需要一千元的生活費用。过了十年之后，一万元的資本是不是被吃光了呢？事实上除了資本家的生活費用之外，資本不但沒有“被吃光”，反而在原先的一万元之外又有新的增加，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資本家也不否認。常州公私合营大成紡織印染公司總經理、私方代表刘国鈞講到自己的一段經歷，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他說，他和一个小时候的伙伴都是出身貧苦，五十年来，他的伙伴一直是工人，而自己則从一个商店学徒变成一个資

本家。他怎样变成一个資本家的呢？那是由于一九一八年他設法湊集了六千元的資本，在常州开办了一家小布厂，剝削工人，因而一步一步发起財来的，到一九三〇年資本額已扩展到三十万元，十二年他的資本增加了五十倍。当时他又提出二十万元，另外再招集股份三十万元，組織大成紡織印染公司，到一九三七年时财产增加到一千多万元。七年之中又增加了二十倍。而他自己除生活消費之外，又盖了住宅，儿子出国留学，花費都是很多的，（此事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大公报）为什么他的資本不但吃不光，反而增加了这許多倍呢？事实很明显，这些財富的增加，假如沒有对工人劳动的剝削，假如資本家发給工人的工資是全部的劳动报酬（全部劳动創造的价值），資本家再“勤儉”也发不了財。究竟資本家的資本是从哪里来的呢？究竟是誰欠了誰的債？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嗎？

二 贖买不是購買而是社会主义 国有化的一种形式

既然資本家的全部資本都是从劳动者身上剝削来的，那末，按理說，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工人階級完全可以通过它自己的政权机关——国家，把資本家的一切财产无偿地收回来，这叫做“物归原主”，这样做完全是正义的，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的工人階級沒有这样做，而是

采取了贖买的方式。以李康年为代表的右派分子却故意歪曲这种政策，把贖买說成是国家欠了資本家的債，是国家和资产階級之間的一笔交易，所以，他們認為應該一手交出生产資料，一手拿进“贖买存單”，銀貨兩訖。他們要求政府按照清产核資的數額百分之百地付足二十二億元。說定息七年是七个百分之五，共計只付百分之三十五，是国家揩了他們百分之六十五的油。这是半贖买。只有延長二十年才是“贖买到底”。甚至还惡毒地說，“贖买”是維持國家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等等，企图歪曲國家的这一重要政策。

这里涉及到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是怎样理解贖买政策；一是贖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們知道，所謂“贖买”决不是买卖关系，不是等价交換。“贖买”這兩個字是借用来的。比方說：有一些东西本来是屬於某甲的，但是被強人搶去了，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可以有兩種办法：一种办法是：用強力去收回来，不給任何代价；另一种办法是：实行妥協，出一点錢去“贖”回来。对于資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資料，也可以这样說。因为，这些东西本来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剝削来的，是劳动人民創造的。我們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須把它收归国有，即收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但收归国有也可以有兩種办法：一种办法是：无代价地沒收过来；另一种办法是：出些錢向資本家贖买回来。怎样贖买法呢？是不是一下子“贖买”？是不是由国家專門拿出一笔錢来“贖买”呢？不是的。“贖买”是指在一个相当的時間內逐步地“贖买”，是指工人階級在这个時期內，在为了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階級生产一部分利潤或利息作为“贖金”，將资产階級占有的

生产資料，逐步轉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財產。

中国工人階級对待民族資產階級，其所以不采取沒收的办法，而愿意付出一部分代价，并不是因为我們对通过沒收以消灭資本家所有制的正义性有什么怀疑，而是为了换取社会主义的和平胜利；为了避免因突然变革而引起的損失，避免生产力降低和工人失业的現象，有秩序地把私人資本主义轉移到社会主义的軌道上来。因此，“贖买”不是普通的交易，而是换取和平地消灭資本主义，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代价。

其次，还因为，我国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中，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革命，或者采取了中立态度，而在参加这个革命的时候，曾經同工人階級結成了統一战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們又表示拥护人民民主專政，拥护共同綱領和宪法。我們实行“贖买”政策，可以繼續保持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联盟关系，可以更好地团結、教育、改造他們，使他們参加国家建設事业，能繼續發揮自己的力量，以增加社会主义建設的助力，减少阻力。

同时，实行“贖买”政策，也是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所允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須廢除資本家占有生产資料的制度，就必須把資本家占有的生产資料收归全民所有，这个原則是不能动摇的。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是采取直接剝夺資本主义的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呢？还是采取和平改造即“贖买”政策使資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呢？这要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历史条件、政治經濟情况和階級力量的对比等来决定。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資產階級占有的生产資料，可以采取“贖买”政策来实行

国有化。这在馬克思列宁的經典著作中都會提到的。由此可見，“贖天”不是購天，而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的一种形式。

應該怎样理解“贖天到底”呢？所謂“贖天到底”，就是国家除了給資本家一定的定息，还給予必要的工作安排，培养他們的工作能力，把他們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是对于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給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們的生活。这都应该看作是必要的贖天办法。因此，贖天的費用，贖天時間的長短，不决定于資產階級生产資料的价值，而是决定于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度和速度，决定于資本家政治思想改造的具体情况。所以，根本不能从資本家的角度，从买卖关系去計算什么够本不够本的問題，因为既然全部資本都是剝削来的，就說不上本錢不本錢。每一个工商业者應該正确認識贖天政策的實質及其重大意义，認真学习，加强自我改造，以便在企业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时候，自己也能由剝削者改造成为一个光榮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贖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們知道，我国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針，是从一九四九年立国之初就确定并开始了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我国就走上了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資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就是贖天的开始。因为，贖天政策也就是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具体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庄严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規定了“国家通过行政

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由此可见，赎买是在我国解放以后，就已经采取了一项重要政策，并不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办法后，才开始实行的。当然，它在我国过渡时期的各个阶段，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和办法是不同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赎买形式采取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所规定的盈余分配办法，即资方所得份额，一般应不少于企业纯利60%；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以后，则采取了按比例分配盈余的制度，资本家所得的股息、红利不超过企业盈余总额的四分之一，即所谓“四马分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形式便采取了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按照私股投资额给以5%的定息。这是赎买的最高形式。赎买形式的这种发展变化，它正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体现了党和国家从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政策。

前面指出：“赎买”不是“购买”，不能以资本家作生意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计算“够本不够本”。但是，如果要真正算账的话，也不妨算一下。从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实行起到定息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二年）共十四年，资本家得到的利润、利息和政府给予资本家的一切照顾费用计算起来，要说“赎买”，恐怕已经过头了。根据公布的资料，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六年当中，全国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所获得的

利潤就达到十七亿二千五百十六万元。把这个数字加上七年定息的七亿七千万元，共計是二十四亿九千五百十六万元。还没有計算一九五〇年前的利潤、私自提取的資金和政府对資本家的照顧費用，就已經超过了資本家的全部资产二十二亿元而綽綽有余。

再看具体的事实：据新华社一个記者的調查，上海工商界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年里，收入的利潤和股息等，就等于全部資金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五，也还没有計算一九五〇年以前的利潤、私自提取的資金以及一九五六年以后的七年定息。常州大成紡織印染公司總經理和私方代表刘国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发言中說：“我所經營的常州大成紡織印染公司是以五十万元資本起家的。解放前，股本为二百二十五万元，清产核資后，按二百二十五万元的八倍計算，股本为一千八百万元。現在大成公司股东每年可收定息九十万元，在兩年半之中，即可收回二百二十五万元的股本。而类似这种情况的并不止大成一家。”

当然，不能光从“錢”来看贖买政策，應該着重領会它的政治意义。如果离开了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不能正确領会国家贖买政策的精神，就必然会放松自我改造，甚至抵抗改造。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不利的。同时，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李康年的所謂“定息二十年”的建議，不是要工人階級对于被强占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再付出加倍的代价嗎？这完全是一副强盜綁票要贖金的面孔。这种对贖买政策的故意歪曲，實質上就是要坚持長期剝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三 定息的性質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

从“四馬分肥”到“定息”，无疑地是一个帶根本性的变化。实行定息后，公私合营企业是在国家直接管理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則进行生产經營。資本家已經交出了三权（生产資料的支配权、企业經營管理权和人事調配权）。定息本身只能提供資產階級一部分生活資料，不可能再轉化为資本。因此，定息制度的实施，就为最后消灭剝削准备了条件。但是，定息是贖买的一种具体形式，仍然是一种剝削收入。在合营企业中資本家虽然已經沒有对生产資料的支配权，可是並沒有否定他对生产資料的所有权。定息是不問資本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一律根据合营时私方清产定股的股金付給固定的息率。資本家凭什么資格領取这笔定息呢？就是凭借在合营企业中核定的股金，即資本家对于生产資料的所有权。尽管有个别的企业在合营后，由于經濟改組或生产改組的結果，他的工厂或商店合并了，搬迁了，甚至机器廢弃不用了，但他依然可以凭借他的核定股金，即資本家的生产資料所有权領取股息。由此可見，定息不是按劳动，而是按核定資本的多少，进行分配的，是資本家凭借对于生产資料的所有权，占有工人无偿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这样，根据資本家对于生产資料所有权而获得的定息，当然是一种剝削收入。但是，以章乃器为代

表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硬說定息不是剝削，只不過是不勞而獲的收入。理由是：剝削應該是痛苦的，而定息並不痛苦云云。說定息是資本家的不勞而獲，這倒沒有錯；資本家獲取定息，的確是沒有付出勞動。但是，這只弄清楚問題的一半。還有一半是：資本家既然沒有付出勞動就獲得了定息，那麼，創造定息價值的勞動是誰付出的呢？當然是工人付出的。這樣問題就很清楚了：定息是資本家的不勞而獲，同時是工人的勞而不獲。這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又是什么呢？

至於認為剝削是痛苦的，而定息則是工人階級願意付給資本家的，並不痛苦，所以不是剝削；這是無視我國的現實條件。他們忘記了在我國工人階級已經不再是政治上受壓迫的階級，而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了，當然不容許資本家無限制地剝削。剝削對於被剝削者說來是痛苦的，但是，痛苦並不是確定剝削的界限。誰都知道，剝削是一種經濟上的關係，它是表明社會上一部分人凭借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如果認為定息是工人階級所允許的就不是剝削，那麼試問：過去資本家按照“四馬分肥”取得一部分企業利潤，也是工人階級所允許的，這也不是剝削嗎？工人階級所以允許七年的定息剝削，主要是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使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平地改造為社會主義企業。同時使工商業者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思想準備和自我改造，安心工作，安心學習，以便在企業改變為全民所有制的時候，個人也能够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實行定息制度，也為工商業者的進一步改造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在這一新的條件下，資本家參加企業的工作，不再是以資本家的身份，而是處於和普通的管理人員一樣的地位。這樣，一方面也

就更加有利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逐步改变他們的私有观念和剝削思想以及在經營管理上的资本主义經營作风等；另一方面，資本家也可以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的經營管理方法，培养劳动习惯，并逐渐依靠劳动收入来代替剝削收入，把自己改造成名副其实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每一个工商业者应该正确体会贖买政策的意义，它的最高形式——定息制度的重大經濟政治意义，努力学习，認真改造，以便創造条件，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或者有人以为，不劳而获不一定就是剝削。例如銀行存款的利息和公債利息的收入等，都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剝削；定息为什么不能是不劳而获，而一定是剝削呢？

这个問題要从兩方面来看：劳动人民存入銀行的存款，是他們的劳动收入的积累，与資本家手中的資本，性質完全兩样；劳动人民銀行存款的利息的来源，是他們以自己的劳动所得为基础而实现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實質上是他們的劳动收入的延續部分，根本不同于資本家的定息是不劳而获的剝削收入。至于資本家的銀行存款的利息，如果他的存款仅是限于他的劳动报酬，那末，这种存款的利息，毫无疑义的是和一般劳动人民的存款利息的性質沒有差別，而与根据合营企业的股权所取得的定息完全不同。但是，如果他們存入銀行的存款，原是一笔尚未动用的資本，存入銀行实现資本的积累，發揮生息資本的机能，那末，这笔資本存款所获得的利息，当然也是一种剝削收入，本質上与定息一样，仅是形态上有所不同罢了。

右派分子所以硬說定息不是剝削，目的是为了混淆階級界限，反对彻底消灭剝削，不承認工商业者还是一个剝削者，以模

糊工商业者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認識。因此，他們接着也就否認民族資產階級在全行业合营后还具有的兩面性。并妄称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是所謂教条主义者为了不要工商业家“驕傲自滿”，硬加給他們的“大帽子”。这完全是故意的煽动和挑撥。

我們知道，全行业合营后，資本家所有制虽然已有很大的程度的改变，生产資料不再由資本家直接支配，而是由工人階級所掌握，但是，資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消灭，在法律上还没有最后廢除，他們还依靠这一所有权获取定息。虽然实行定息后，構成剝削的条件是削弱了，但是，資本家私有生产資料的所有权和剝削仍旧存在。因此，以占有生产資料和剝削工人階級为特征的資產階級就仍然存在。其次，我們知道，人的思想意識，一般总是落后于經濟地位的变化。目前資本家的經濟地位虽然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們的階級本性不能随着这种变化立即消灭，加以目前他們还没有完全脱离剝削者的地位，还正处在由剝削者向劳动者的轉变过程中。因此，他們的立場、观点、思想感情以及生活习惯，同工人階級还有着本質的差別，只要資產階級还未完全消灭，他們的这种思想观点，也必然会体现到階級关系上来，而表现为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兩面性。所以，民族資產階級依然有兩面性，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决不是什么人硬要給工商业者戴帽子。当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也随着起了变化，和过去有所不同了。这也是應該承認的事实。

在全行业合营以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主要是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和发展資本主义的消极性。他們一方面表示拥护人民民主專政，拥护共同綱領和宪法；另一方面又有发展資本主

义的强烈愿望。一方面表示接受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或者在不同程度上抵抗限制和改造。当全行业合营后，由于经济关系起了变化，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有了新的内容。这主要是：一方面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合营企业中的生产管理人员，许多人安心工作，要求学习，靠拢党和政府，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还领取定息，保持一定的剥削；而且尚有不少人留恋资本主义道路，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某些人对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表现犹疑、动摇、甚至反对。例如，有的人留恋剥削，企图长期保留定息；有的人混淆阶级界限，反对自我改造；有的人要求撤消公方代表，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有的甚至搞自发工厂等等。但从目前总的情况来看，他们积极的一面正在日趋扩大；消极的一面正在日趋缩小。但必须正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帮助他们全面地了解自己的阶级特点，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学习和改造，不断扩大积极的一面，克服消极的一面。这不仅有利于工商业者，也是有利于全国劳动人民的。

可是，以章乃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反对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两面性”的问题上极尽歪曲和挑拨之能事，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硬说成是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经济上的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五毒。他说：“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的概念是什么？那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然后又假装着工商界人士的口吻说：“工商业家问：‘为什么还是一个两面性？’‘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

大多数改造成成为劳动农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还是两面性呢？‘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誰說全行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是“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经济上的有利于国計民生和‘五毒’”？有誰說过今天的中国还要来一个“五反”呢？誰都知道，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反动的地主阶级则是專政的对象。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論呢？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用这种挑撥的手段来达到否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存在，否認改造的意义，煽动工商界反对党和政府，用意是十分惡毒的。

应当指出，我們說民族资产阶级有兩面性，并不是說这种兩面性在每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身上都是相同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經歷着一个深刻的分化过程，这个阶级中的成員在向劳动者的轉变进度上不可能是一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兩面性，在它的成員之間，就有程度的不同。对于少数的左派分子來說，主要是偏重于积极性的一面；他們基本上抛弃了資本主义的立場，而轉到工人阶级的立場，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領導，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小部分人至今仍然坚持資本主义立場，抗拒改造，反对共产党的領導，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图使資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当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限于资产阶级分子）。其中的极右分子野心很大，不仅有反动的言論，而且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对于资产阶级的右派來說，他們只有消极的一面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面性。对于人数最多的中間分子來說，經過几年的教育和学习，他們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共产党的領導；他們在从資本主义立場到工人阶级立